

# 關於「跪」與「不跪」的故事

• 雷 頤

中國素以「禮義之邦」自居，對「禮」自然格外注重。在所有禮儀中，最為莊嚴、神聖、隆重、嚴格與不可「冒犯」的，當屬覲見皇上之禮。大概中國的皇帝們早就「不教自明」如今才流行的後現代「文化理論」：禮儀的實質是一種「文化資本」，是「權威」的象徵或來源，維護、加強「禮儀」就是維護、加強「權力」，所以要不顧一切地維護「成禮」，有時甚至重「名」遠甚於重「實」。由於「中國」是位於「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國」，所以華夏之外統統是「不文」的野蠻世界。其他民族、國家都是「化外之邦」的「夷」、「狄」、「蠻」、「番」。而且，又以中國作為遠近的標準，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為「生番」和「熟番」，對其名稱的漢譯往往還要加上「彡」（以示尚未成人）或「口」（以示可「吃」，類同動物）作為部首。無論「生番」還是「熟番」，都要靠中國的聲名文物、典章制度、禮樂規範來「教化」。

但就在乾嘉盛世，來自化外嘖嘖的「番臣」馬嘎爾尼 (George Macartney) 和阿美士德 (William Pitt

Amherst) 卻偏不肯行覲見皇帝的跪拜之禮，不僅明拒「教化」、自甘墮落，且生出一段又一段難了的「是非」。

乾隆五十八年 (1793) 馬嘎爾尼率團來華，因覲見皇上之禮與清廷爭論不休，馬氏要求按「平等對待」原則，如果要他向中國皇帝行雙膝跪拜之禮，中國官員也應向英國女皇像行此禮，否則他只以向英皇所行之僅屈一膝的吻手禮向乾隆行禮。此為中國官員嚴拒，但最終還是中方妥協，同意英使不行雙膝觸地的跪拜之禮而只屈一膝的要求。當據劉半農譯《乾隆英使覲見記》載馬嘎爾尼自述當時爭議情況分外有趣，特引如下：

余曰：「英使禮乃係屈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親之。」彼等大詫曰：「怎麼！這事在咱們皇上面前使得麼！」余曰：「自然使得！敝使以見本國皇帝之禮見貴國皇帝，已屬萬分恭敬，何言使不得？」言次，屈一膝作行禮之狀示之。三人領首而去，容色似已滿意，不復如前此之極力喧辯矣……未幾，韃靼欽差又來言：「目下

決議，請貴使行英國禮，但照中國風俗說來，拉了皇帝的手親嘴，總不是個道理。擬請貴使免去拉手親嘴，改用雙足下跪以代之。」余曰：「敝使早已說過不用中國禮，這雙足下跪，還不是中國禮麼？此禮，諸位行得，敝使行不得。」金大人曰：「既如是，雙足單足，且不去管它，那拉手親嘴，總得免掉才是。」余曰：「此則悉聽諸君之便。但諸君記着，此係諸君之意見；非敝使之意見。敝使本欲向貴國皇帝行個全禮，今屈從諸君之意，改做個半禮了。」至是，辯論已終。

當時就有人不願正視此點，刻意編出英國使臣稍後覲見乾隆帝時「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的神話。不過此時正值盛世，大多數人對此並不十分在意。無人料到此事其實是幾十年後中國文化要遇到一個更強的文化的巨大挑戰、產生嚴重危機的先聲和預兆。

嘉慶二十一年(1816)又有阿美士德率團來華，又因是否跪拜而爭論不休。滿清官員讓他星夜從通州趕到北京覲見嘉慶皇帝，想趁他舟車勞頓未消之時勸誘他屆時向嘉慶帝行三跪九叩之禮，不料卻被他堅拒，與其副手一同稱病不出。嘉慶皇帝自然大怒：「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當日便傳旨遣其回國。事後又有廷臣謊稱係因來使行走一夜，朝服未到不敢瞻覲。嘉慶帝下諭怒斥有關官員，並對其作了革、降職的處分。沒想到，「跪」與「不跪」竟釀成如此一場政壇風波。不過，嘉慶皇帝卻是相信當年馬嘎爾尼拜見乾隆皇帝是「齊膝地」的，在此番《賜噶咭喇國王敕諭》中云：

爾國遠在重洋，輸誠慕化……特命大臣於爾使臣將次抵京之時，告以乾隆五十八年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此次豈容改異？……爾國王恭順之心朕實鑒之，特將貢物內地理圖、畫像、山水人物收納，嘉爾誠心，即同全收，並賜爾國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盤、大荷包二對、小荷包八個，以示懷柔。至爾距中華過遠，遣使遠涉良非易事……嗣後無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但能傾心效順，不必歲時來朝，始稱向化也。俾爾永遵，故茲敕諭。

「天朝上國」那種自高自大、「德威遠被」的「寬宏大量」，於此表現無遺。

但幾十年後幾乎是接連兩次鴉片戰爭，使中國傳統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華夏中心」世界觀的徹底崩塌。這種崩塌不僅是國家主權、領土等受到侵犯，而且與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傳統的綱常倫理、禮儀規範等等開始動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締約談判中，清政府對英、法侵略者割地賠款諸條照單全收，但對英法代表提出向皇帝親遞國書的要求卻嚴加拒絕，並激烈抗議道：「此事業關係國體，萬難允許」，表現出少有的堅決。視「禮儀」重於「地」與「款」，頗得「後現代」神髓。不過幾經談判之後，清廷還是不得不同意外國公使駐京，這使「天朝體制」被打開一個不小的缺口，覲見皇帝之禮便遲早要發生變化。這一過程無疑是痛苦的，一些士大夫更不願面對這一無情的現實，只得無奈地尋求一種精神的自慰。

對他們來說，最不能忍受的是最高的禮儀——晉見皇帝的禮儀——居然受到了「褻瀆」。那些屬於化外

「生番」的「洋鬼子」，作為「貢使」到位居「世界之中」的「朝廷」拜見皇帝即「真龍天子」時，竟然拒不跪拜，而只行鞠躬之禮，「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在洋人的船堅炮利面前，「朝廷」亦無可奈何，最後只得聽其鞠躬而不跪拜。對此，那些士大夫們更是毫無辦法，卻又不能「視若無睹」，好像比朝廷還咽不下這口氣，只好再次流播這些洋人「一仰天威」便自動「伏地恐後」的神話聊以自慰。據當時名士李慈銘日記所云，在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初五，英、法、美、日、俄、荷蘭等國公使覲見並呈遞國書：

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閣見西洋各國使臣，文武班列，儀衛甚盛。聞夷首皆震慄失次，不能致辭；跪叩而出。謂自次不敢復覲天顏。蓋此輩犬羊，君臣脫略，雖跳梁日久，目未睹漢官威儀。故其初挾制萬端，必欲瞻覲；既許之矣，又要求禮節，不肯拜跪。文相國等再三開喻，始肯行三鞠躬；繼加為五鞠躬。文公固爭，不復可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蓋神靈震疊有以致之也。

同時，時人陳康祺在聽說同治帝親政，外國使臣晉見時只鞠躬不跪拜後，忿忿然想起馬嘎爾尼的那段故事，在《郎潛紀聞初筆》中寫道：

乾隆癸丑，西洋噶咭喇使當引對，自陳不習慣拜跪。強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覺雙跪俯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詩》有「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康祺憶穆宗親政後，泰西各國使臣咸請覲見。先自言用西禮折腰者三，不習中國拜跪。通商衙

門諸大臣曲意從之。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

無疑，陳氏篤信此事，所以要怒責「通洋務」的總理衙門諸大臣不以此「故事」來與洋人相抗爭。不過陳氏卻未意識到，他的如此義正辭嚴的立論實際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天威能使萬心降」，能使拒不跪拜、而且朝廷也已「恩准」其不跪拜的洋人到時會不由自主地「齊膝地」，那麼這根本就不成問題，「諸大臣」也就根本不必與之「相詰責」了。當然，結果是「神話」終歸破滅，此番諸使確實未「齊膝地」行「中國跪拜」，而只行「折腰者三」的「西禮」。

80年間這前後幾段關於「跪」與「不跪」的「故事」，反映出一種複雜的心態。神話終究要被現實打破，所以還是曾任吏部主事的吳可讀的自慰「理論」更「實際」一些。他見根本不可能強令「夷酋」跪拜，便乾脆上《請勿責諸使跪拜疏》說：「彼本不知仁義禮智信為何物；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為何事；而我必欲其強行五倫之禮。是猶聚犬馬豕羊於一堂，而令其舞蹈揚塵也。」這樣，「即得其一跪一拜，豈足為朝廷榮；即任其不跪不拜，亦豈為朝廷辱」。畢竟是官場中人，通權達變，不似那些完全不顧現實的腐儒只知一味自我欺騙，才提得出這阿Q式既屈從現實，又能獲得自我心理滿足、自我圓場的好「說法」。

**雷頤** 1956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副主編、副編審。